



论中国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、儒家传统及当代实践方向(吴光)

(2005-7-14 12:55:01)

作者：吴光

[论文提要]本文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、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思考我国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、历史传统及当代实践方向。作者认为，廉政文化，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、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，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、精神、制度、风俗与人文素质。中国廉政文化传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一环。当代我国廉政文化的实践方向，应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背景下，从思想建设、道德教育、制度建设、作风建设四大方面着手进行，做到古为今用、洋为中用、综合创新、与时俱进。

关键词：廉政文化、理论内涵、儒学传统、实践方向

廉政，是古往今来清明政治的重要内容，也是儒家思想家的崇高理想。廉政文化，属于政治文化范畴。那么，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是什么？儒家的廉政传统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？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是什么？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贡献一得之见，敬请方家批评。

一、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

要弄清廉政文化的内涵，先要澄清“廉政”与“文化”的基本涵义。

“廉”作为为官者之品德（官德或政德），有清正、俭朴、明察等多重涵义。专讲古代礼制和官制的儒家经典《周礼》对官吏之廉德有一个很全面的说明，即所谓“六计”（从六个方面去考核）：“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就是说，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、能干、敬业、公正、守法、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“廉”。可见，在儒家看来，官德是以廉为本的。

关于“政”，儒家创始人孔子有个很好的诠释。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：“政者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这里的“正”，既有公正之意，也有正派之意。就是说，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私、光明磊落。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，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。

概言之，“廉政”就是“廉正”，是指公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。这种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形成，是与官吏的廉德密不可分的。

那么，什么是文化呢？关于“文化”的定义，古今中外大概不下数百种了。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广义、中义、狭义三种。广义的“文化”等同于“文明”概念，包括了整个人类历史所积累的物质文明、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；狭义的“文化”概念指的是观念形态的文化，如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等等。中义的“文化”概念主要是指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，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、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、宗教、文学艺术以及礼仪风俗等精神文化产品、文化传统和文化现象。而“文化”的基本涵义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理解，就是“人文教化”之意，即以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教育包括各级官吏在内的全体人民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给“廉政文化”下一个定义：廉政文化，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、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，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、精神、制度、风俗及人文素质。

当然，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，廉政文化的实际内容是丰富多彩的，远非下一个定义那么简单。但从对这个定义的理解上，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分析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：第一是思想，即建设廉政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。第二是精神，即建设廉政文化的人文精神。第三是制度，即确保长期维持廉政局面并能及时揭露腐败行为的文化监督制度。第四是风俗，即通过舆论宣传与道德教育发挥其文化功能，促使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廉正为荣、以贪渎为耻的良好风尚。第五是人文素质，社会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执政者素质优劣的从政道德标准，从政者本身则应自觉培养廉政意识，做到“行己有耻”、“三省吾身”，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，做一个高素质的从政人才。

二、儒家文化与廉政传统

有人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孔子对春秋末期“礼崩乐坏”的乱局非常不满，主张复兴礼乐，认为“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又说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即认为礼并非指物质享受，乐并非是敲钟打鼓，意指礼乐不只是娱乐享受，而是严肃的政治文化。

在儒家的礼乐文化中，有所谓“德音”之说，即以音乐象征政德。儒家经典《礼记·乐记》篇记载说：“先王之为乐也，以法治也。善则行，象德矣。……乐者所以象德也；礼者所以缀（止）淫也。……廉直、劲正、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。”是说以往的高明统治者是按照一定的法度制礼作乐的。音乐象征德政，礼仪用以制止骄奢淫逸之风。奏响象征廉正、庄严、诚信的德音，就会使人民肃然起敬，服从统治。该篇又引孔子弟子子夏之言说：“纪纲既正，天下大定。天下大定，然后正六律，和五声，弦歌诗颂，此之谓德音。”可见德音是配合德政的。其中“五声”，指钟、石、丝、竹、鼓鞀之声。而丝声与廉德相配。所谓“丝声哀，哀以立廉，廉以立志。君子听琴瑟之声，则思志义之臣。”就是说，有德之人倾听音乐，不是起骄奢淫逸之心，而是立廉正之志，自觉地当个实践礼义的好官。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，这个“礼乐文化”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就是廉政文化。

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，可以说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，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。孔子所谓“政者正也”一语，就是千古不易之言。他的“仁者爱人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转引）、“修己以敬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、“礼，与其奢也宁俭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等等主张，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。孟子基于其“民贵君轻”的民本思想，提出了“君民同忧乐”的廉政思想。他说：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这就是宋儒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的源头。《管子·牧民》篇说：“国有四维”、“四维张则君令行”、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、“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逾节，义不自进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”以礼、义、廉、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，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。而在四德之中，“廉”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。不逾节，不自进，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；廉者必知耻，知耻则知廉。可以说，儒家以“礼义廉耻”为准则的政治文化，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。

尽管在中国长期封建、半封建社会中，由于阶级社会的固有本质和封建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流毒，其社会政治局面往往是衰世长而盛世短，官场中则往往是清者少而浊者多，廉者寡而贪者众，但真儒、清官、廉吏依然不绝如缕，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股清流——儒家廉政文化传统。这个廉政文化传统，我们可从历代正史的《循吏传》可见一斑。例如：

司马迁的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与班固的《汉书·循吏传》，记录了各种类型的清官廉吏，有宽政为民者，有以身作则者，有引咎请死者，更有廉正奉法、严拒贿赂送礼者。他们笔下的“循吏”，大多是儒家政治人物，是“奉法循理”、“谨身帅先，居官廉平”从而获得人民爱戴、使得远近效法、政治清明的好官。如身为鲁相的公仪休，以“不与下民争利”、拒绝客人送鱼而深得民心（见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）；官至大司农的朱邑，为人淳厚、廉平公正，“身为列卿，居处俭节……家无余财”（见《汉书·循吏传》），算得上是清官。

唐高宗及武则天时代的名臣狄仁杰，人称“狄公之贤，北斗以南一人而已”。他任大理丞时，有两名武将误砍了昭陵（太宗陵园）的柏树，罪当免职。但唐高宗却要下诏诛杀二人，狄仁杰面奏皇上，力辩其罪不当死，奏称：“今误伐一柏，杀二臣，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？”这才说服高宗免了二臣死罪。武则天称帝时，许多大臣唯唯诺诺，独狄仁杰一身正气，敢言直谏。武则天把狄仁杰从河南调入中央任宰相，为了笼络狄仁杰，对狄说：“你在汝南有善政，但有不少人暗地里举报你，你想知道是谁吗？”狄仁杰回答说：“陛下如认为臣有过错，臣当改过；如认为臣无过错，则是臣之幸运。臣不愿知道是谁暗中告状。”武则天赞叹说：“真有长者之风啊！”武则天要立侄子武三思为太子，狄仁杰以儒家伦理为说予以反对。武则天要费银数百万造大佛像，国库不足，诏令天下僧众“日施一钱助之”，狄仁杰以“边陲未宁，宜宽征镇之徭，省不急之务……（造佛像）既费官财，又竭人力”等理由力谏，使武则天罢除此役。如此等等，体现了一位廉正官吏的高尚人格。